



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丛书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组编

实践与真理

——认识论研究

陶德麟◎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丛书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组编

实践与真理 ——认识论研究

陶德麟◎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王春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 / 陶德麟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01-017640-6

I. ①实… II. ①陶… III. ①真理的标准—研究 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 IV. ①B023.3 ②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5604 号

实践与真理

SHIJIAN YU ZHENLI

——认识论研究

陶德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59 千字

ISBN 978-7-01-017640-6 定价: 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1931年10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武汉。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专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84年起任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创建人。1987起任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先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至“十五”规划哲学组副组长、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学科召集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创新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和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顾问,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哲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多项。其论著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图书奖、湖北省人民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曾获人事部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应邀赴美、德、法、日等国访问讲学,受聘为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获池田大作颁发的日本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其事迹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

自序

本书是我六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部分成果的汇集。由于论述的内容涉及认识论的诸多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汇集起来也就成了一部表述我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见解的专著。

我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是“九一八事变”的同龄人。“七七事变”的时候我还不满7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随家转徙各地，没有上小学。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除了由父母给我讲授了一些语文、英语和算术知识之外，还由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学养深厚的友人程炳文、杨相霖先生教我读了《四书》、《诗经》、《古文观止》等古书的一部分，学会了中国古典诗词格律，打下了初步的古文基础，同时也很自然地接受了一点中国古典哲学的熏陶。这是在小学里很难得到的。1943年我在抗战时期的湖北省会恩施考上了省立实验中学初中。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极为艰苦。那时正是全民抗战的年代，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炽烈如火，抗战胜利的信念坚如磐石，乐观向上的情绪弥漫全校。除了发奋学习之外，我们还在张影波老师的指导下组织过抗日合唱团，排演过歌剧《流亡三部曲》。学校对学生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抓得很紧，要求非常严格。

以语文为例，那时的涂润躬老师和屠博文老师不仅教我们读了鲁迅、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等当代名家的一些作品，还教我们读了一些古文名篇和古典诗词，要求我们能背诵，能译成白话文，学着撰写文言文，这又使我有了接触中国哲学思想的机会。1946年回到武汉升入实验中学高中以后，学校对学生学业要求更加严格。例如给我们讲授语文（当时叫“国文”）的老师贺良璜（诗人，解放后任湖北大学教授）、罗书慎（著名国学家罗峻教授的女儿）、魏其巍（钱钟书先生的学生）都是名师，他们不但教我们读了不少诸子百家的名篇，还要求我们能写文言文，而且他们亲笔圈点，精心写出文采粲然、书法遒劲的评语。这不仅在写作能力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使我更多地涉猎了一些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教我们历史课的曾宪根老师还给我们讲过一些西方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当时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极端不满，中国又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这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关于国家命运、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在作文和周记里写的东西实际上是与哲学有关的^①。我那时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听了胡适、张君勱等人来汉的讲演感到非常失望，觉得他们虽然名气很大，观点却是言伪而辩，为腐朽的统治辩护，与广大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但凭我当时那点皮毛的哲学知识又深感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的能力，非常苦闷。于是我与几位同窗好友一起秘密阅读了公开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②，这才开始朦胧地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常识，当时

① 这些习作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如《孟子距杨墨之意何居？》、《孟荀论性平议》、《评墨子兼爱》、《论王安石》、《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论韩非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文天祥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试申其义》等等，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学步履痕——陶德麟中学作文与读书笔记选》。

② 这本小册子是从武汉的地下党传出来的，没有署名，但当时我们知道作者是毛泽东。

就有了一种拨雾见天的惊喜之感。但当时我还并未打算以哲学为终身职业。

1949年我考取的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中大学外文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我选择了入武大经济系学习。那时全校师生都在党的领导下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也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环境。恰好那时为我们讲授社会学课程的刘绪贻先生采用的教本是李达同志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①，这使我有幸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开了眼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为了弥补知识的缺陷，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我自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还钻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选修了形式逻辑、微积分，旁听了戴春洲先生讲授的普通物理等课程，自学了一点中外哲学史，到华中大学旁听过韦卓民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哲学。我很快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笃信者。1953年李达同志来武汉大学就任校长，指定我留校担任他的科研助手，他亲自约我谈话，以父辈的热情表示了对我的期望，勉励我终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56年他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②，亲自兼任系主任，我也就成了第一批青年教师。在李达同志的鼓励和安排下，我发奋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5岁起就开始讲课，同年开始在《哲学研究》、《红旗》、《人民日报》、《新建设》等刊发表哲学论文。1961毛泽东同志委托李达同志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李达同志指定我为主要

① 这是毛泽东对此书的评价。

② 武汉大学哲学系创建于1922年。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北京大学，1956年由李达同志主持重建。



执笔人。^①从此我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至今六十多年了。

在学习和探索的生涯中，我越来越体验到在几千年的世界思想史上出现的社会历史理论和哲学理论浩如烟海，体系纷繁，其中有许多思想包含着合理成分和深刻内容，我们必须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些世界文明大道上的宝贵成果，有分析地吸取它们的精华，而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笔抹杀。没有对这些成果的吸取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但是，由于历史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和阶级利益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以前，对人类社会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前景如何，道路如何，一直还是一个没有人能真正打开的千古“暗箱”。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找到了打开这个“暗箱”的“钥匙”，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切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说它提供了探索问题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走出障眼的重重迷雾，引导人们走上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实现这样石破天惊的空前的大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对实践的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揭示了实践在全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对这种发展的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科学的实践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一根统领全局贯彻始终的红线，是一块不可须臾离开的基石。不吃透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这个有机整体的真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此书的原定名称，李达主编。上卷为“唯物辩证法”，下卷为“唯物史观”。上卷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李达同志含冤去世，未能出版。12年后我遵李达同志临终嘱托，对上卷做了修订，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以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

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共湖北省委要我和其他几位教师为全省高中级干部做哲学辅导报告，我担任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使我有机会多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力求弄清这个问题，加深了认识。

我还由此体验到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并不表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大地的阳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共同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不仅因为它是迄今以来最正确最深刻的哲学，还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不断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丰富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给予理论的回答，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命之源和必由之路。归根到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刻骨铭心的启示，这场亲身经历使我更痛切地省悟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明的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的正确解决确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就会扭曲变质，甚至走向反面，我们就会陷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页。

② 见本书附录《参加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会的前前后后》一文。



实践相脱离的境地，造成严重的灾难。这是关系民族兴衰、祖国存亡和人民祸福的绝大问题。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如果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失职。当年我曾奋不顾身地与许多同志一起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就是因为感到责无旁贷，不能不同大家一起尽一点微薄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形势下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的丰富经验，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做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指出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有千钧之重，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指南。理论界的许多同志发表了重要的有关论著，我从中受到了许多启发。我只是这支大队伍中的一名老兵，虽明知老之已至，还不敢懈怠。但自知才疏学浅，所学所见不过是管窥蠡测。这本书也只是一个探索者的雪泥鸿爪而已，恳望得到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陶德麟

2017年5月于珞珈山麓

目 录

一、真理标准问题探析	1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3
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	16
认识的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篇对话	35
实践怎样检验认识?	48
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	66
评实用主义的真理论	83
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108
论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	117

二、认识论散论	135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37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	161
何谓彻底认识世界? ——关于不可知论	166
浅议“主体”	174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认识结构	177
科学合理性与真理	187
再谈科学合理性与真理问题	190
悖论与认识论	194
一本研究精神动力的好书	197
对认识活动论的新探索	200
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204
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	208
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	218
略论辩证法与和谐问题	230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	244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255
略论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借鉴	266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	286
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314
三、《实践论》浅释	319
写在前面的话	321
毛泽东:实践论(全文)	325

《实践论》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	341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关于认识规律的科学理论.....	350
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	398
四、附 录	429
参加 1978 年真理标准讨论会的前前后后	431
陶德麟：笔有雷鸣道不孤	449

一、真理标准问题探析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领域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搅得混乱不堪，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其集中的表现，就是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语录和权力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这一根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过多次明确论述的，本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竟成了陌生的命题，甚至被有些人说成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无从说起。这是关系到坚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贯彻十一大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胜利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重大问题。既然认识上还有如此重大的不一致，那么通过讨论正本清源，就是实际生活发展的必然要求了。我这里仅就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1. 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

真理问题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各派哲学那里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共同的核心无非是两大问题：一是真理的

^{*} 本文是作者1978年7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上的大会发言。由于当时中央某些负责人还在坚持“语录标准”，若公开发表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故本文的第一、二部分未在刊物上发表；第三部分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标题，发表于1978年《哲学研究》第10期第二篇。现在收入本书的是发言的全文，标题是收入本书时修改的。

定义；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逻辑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只有明确了真理的定义，才知道检验的真理指的是什么。真理的定义也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符合说、融贯说、效用说等。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以圣人之言为标准，以大多数人的同意为标准，以已有的理论为标准，以概念社会明晰为标准，以是否“有用”为标准，还有根本否认任何标准的，这里也无须一一列举。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都把真理定义为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在真理定义问题上没有分歧，无须涉及过多的问题，使讨论发生枝蔓。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以什么为标准来判定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的唯物主义者也接触到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但那只是偶然的、带有猜测性质的思想火花，并没有上升为哲学的基本命题。其根本原因是旧唯物主义者根本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对实践本身的理解就是片面的、狭隘的，也不理解检验真理是一种什么过程。他们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理解实践，无法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了解实践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包括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作用。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症结和真正困难。因此，他们在精巧的唯心主义面前软弱无力，留下了可乘之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把科学地界定了的实践作为全部人类生活的基础，才第一次彻底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 1845 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极其明确：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sta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